

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

阎学通

自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介绍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在理论创新方面却长期没有突出成果。为此我于 2005 年开始尝试从阅读先秦诸子有关国家间(inter-state)关系的论述中寻找创新理论的出路。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能创造出成体系的理论,但是我写的几篇有关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文章已经引起了学界同仁们的关注。我很高兴看到王日华、徐进和杨倩如三位青年学者针对我的三篇文章所做的批评,这篇文章将从为何研究、怎样归纳、如何理解、借鉴什么以及怎样联系中国崛起五个方面,回应他们以及其他一些同仁对我的批评。

一、为何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

一些国际同行以为我挖掘先秦国家间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实这是对我研究先秦思想的误解。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客观、可实证,可公开。科学的这种性质决定了科学的理论必然是普世性的。由于我相信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普世性的,因此从一开始研究先秦哲人思想,我就无意创建“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有如下三个目标。

《国际政治科学》2009/3(总第 19 期),第 150—165 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national Politics

(一) 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的崛起使中国政府和学界同仁重新燃起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强烈愿望。1987 年中国学者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时,就提出了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在缺少国外重大理论创新可介绍的情况下,2004 年中国学者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时,又一次提出了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任务,并说“创建中国学派,这已经成为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此后,有关要建设“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越来越多,政府对此事的积极性也越来越大。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裘援平发表文章讲述了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性,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兴起的大国,没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是不行的。”

面对不断上升的建立“中国学派”的舆论,我不由自主地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自 1987 年以来的 30 多年里,创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呼声日益高涨但却没有任何中国学者创建出成体系的理论呢?即使今后创建出成体系的理论,这种理论会被视为是“中国学派”吗?为何先秦时期众多的思想流派,如儒、道、墨、法等都被冠以“中国学派”这一称号呢?为此我写了几篇关于不可能出现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通过近几年对先秦时期关于国家间政治思想的研究,我更加坚信将借鉴先秦的思想发展和丰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包括将两者结合创造出新理论是可能的;反之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视为西方理论,与之保持距离,执意建立与之不同的“中国学派”理论则可能劳而无功。

先秦哲人对于国家间政治的认识与现代人不同,但这并非是东西方的思想认识不同,而是对国际事务本质的认识不同。也就是说先秦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和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是普世性的。先秦时期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当

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87 页。

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裘援平:《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若干看法》,《中国国际战略评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2 期,第 1 页; Yan Xuetong,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School of IR Theories," 载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4—301 页。

时的一些认识仍可用于解释今天的现实,这说明当时的认识具有很强的普世性,与客观规律非常接近。因此,从普世性的角度理解先秦的思想,是有可能将其用来增强现有理论解释力的。自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以来,我一直试图在结合先秦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创建新理论,而不是以先秦思想为基础创建新理论以取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二) 深化对现实国际政治的理解

对于研究先秦国家间思想最多的批评有两种:一是先秦著作的作者、内容和时间的真实性是有争议的,在真实性不确定的条件下取得的研究结果是不可靠的;二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间关系与现代国家间关系不同,因此所总结的经验缺乏现实适用性。然而,这两种批评在逻辑上都不能否定研究先秦思想可以深化我们对今天国际政治的理解。

首先,著作真实与否并不影响我们对于这些思想的借鉴。即使我们接受先秦诸子的著作是后人在汉朝时期重写的假设,这些著作仍是距今两千年前成书的。著作中的思想仍能反映两千年前人们对于国家间政治或是对于先秦时期国家间政治的认识。其中那些仍能解释今天现实国际政治的认识,完全可以被我们视为国际政治公理性的原理。此类认识有助于深化我们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所观察到的,“政治法则的根源是人性,自从中国、印度和希腊的古典哲学努力发现这些法则以来,人性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古老而适于现代的认识才是可靠的理论创新基础。对于先秦思想中那些不能解释当今国际政治的认识,我们可将其视为是对特定国际体系的认识,此类认识有助于我们区分和识别不同国际体系的特殊原理。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可以提供许多思想启迪。事实上,不仅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有所不同,欧洲古代的国家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也不相同。然而人们从不质疑可以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去汲取历史经验来理解现代国际关系的现象。该书记录的是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但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却从中汲取了很多思想,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4.

并创建了成体系的理论。该书中的“强者为所欲为,弱者忍气吞声”,已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著述中最经常引用的名言之一。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政治与现代国际政治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是无政府体系性质,国家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而没有一个能垄断军事暴力的体系力量。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朝所制定的国家间行为规范对诸侯国行为的约束力还不如 21 世纪的联合国规范。因此无论是从中国历史文献的思想性角度讲,还是从春秋战国与现代国际体系相似性的角度讲,挖掘先秦国家间思想都有助于我们发展和丰富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

此外,春秋战国的国家间体系与古代欧洲体系和现代国际体系的差别,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发展新理论的条件。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是以欧洲历史和欧洲政治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比较先秦体系与欧洲和现代体系之间的差别,比较先秦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都有助于我们修正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错误和弥补其不足。布赞(Barry Buzan)和利特尔(Richard Little)就是通过对比全球不同地区国际关系体系的比较,创建了他们的国际体系理论。

(三) 指导现实政策

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我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目的是为了古人而是为了今天,特别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大业。论证先秦著作的真伪以及其中历史事实的真伪是史学家们的工作,而非政治学研究古代文献的目的。在 21 世纪,中国面临着崛起成败的历史考验,世界则面临着中国崛起对世界可能产生的不确定影响。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指导我们的现实政策。从中国角度讲,我们可以从先秦思想中汲取大国崛起的经验和学习大国崛起夭折的教训。从世界角度而言,我们可以思考如何才能使中国崛起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国际规范的进步。

根据先秦思想,中国崛起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战略目标,即建立王权还是建立霸权。前者将是一种相对和谐的国际体系,后者则是一种常见的国际体系。

Phil Williams, et al, eds, *Classic Reading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ond Ed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25.

Phil Williams,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同样,世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也有两种选择,即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还是重复美国霸权式的秩序。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不仅要改变国际实力格局还得改变国际规范。借鉴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并不必然导致我们推崇和恢复东亚历史上曾有过的朝贡体系。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使朝贡体系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现代国际交往已无需要借助朝贡这种方式。航空技术使大国领导人一年之内数次相见,运输技术使国际贸易成为日常行为,因此朝贡形式已无用武之地;二是以主权平等为核心的现代国际规范已经成为普世理念,以朝贡式的等级规范取代现行主权平等规范已不可能;三是先秦思想流派众多,各派对于朝贡方式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故此借鉴先秦思想也不必然导致走向朝贡体系。

二、怎样归纳先秦哲人的认识观念和分析方法

对先秦诸子们的分析层次进行分类,是一个学术性很强但难于达成共识的问题。首先,先秦诸子们对于同一问题在体系、组织、个人三个不同层次上都做过分析;其次,他们对于战争原因的分析 and 实现和平的分析,可能是在两个不同层次。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多因一果是个普遍现象。多种原因可以引发同一种疾病,不同的治疗方法也可以治愈同一种病。在研究先秦诸子的分析层次时,如果我们所依据的分类标准不同就可能出现认识分歧。例如,以战争原因为标准和以实现和平为标准进行分类,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

分析层次类别的标准不统一很容易造成分类的不同。杨倩如博士在诸子分析层次上与我有分歧。她将诸子的分析层次分为四类,即孔子和孟子的王道出发点,管子和荀子的霸道出发点,老子和韩非子的对立统一观念,墨子的德化观念。杨博士与我分歧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的分析层次标准不同。我依据的是沃尔兹(Kenneth J. Waltz)提出的国际关系三个分析层次,这种分析层次目前是学界普遍使用的标准。杨博士自建的分析层次与沃尔兹的不同,因此我们对先秦诸子的分析层次类别认识不同。此外,杨博士的四个分析层次的原则存在着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她依据政治立场对孔子、孟子、管子、荀子、墨子进行

分类,但却以思维方式对老子和韩非子进行分类。分类原则不一致,会使类别变得不清晰。

徐进博士认为荀子的分析方法不应属于体系层次,而应与孟子同属于个人分析层次。徐进博士与我的分歧在于如何理解荀子对于战争根源的认识。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根据“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这句,徐博士将荀子的分析归入个人层次。我以为荀子是个内外因结合的二元论者。他认为人性恶是战争的内因,没有社会等级区分是战争的外因,只有两者结合时才会发生战争。荀子在批评孟子的性善论时明确将人性作为常量。他也因此将等级规范当成变量。我们以变量为标准划分荀子的分析层次将比从常量角度划分更有意义,因为常量是不变的,不宜作为方法论中的自变量使用。例如,新现实主义也承认人性和国家追求利益是战争原因,但该学派认为这两者是常量,他们从国际格局这个变量角度去理解战争原因。因此该学派被归入体系层次分析而不是个人或组织分析层次。

依据观念决定论、物质决定论和两者结合的二元论这三个类别,我将先秦诸子的哲学观念进行了分类。有的学者对我所做的具体分类持不同看法。例如杨倩如博士不同意我将老子的哲学观念归为观念决定论,其理由是儒、法、墨、兵、阴阳、管子等其他思想流派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老子的某些观念。然而老子的观念被其他学派借鉴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老子的哲学观念不属于观念决定论。儒家与墨家是观念决定论,他们继承老子的一些观念只说明他们都是观念决定论者。管子、荀子、阴阳家是观念与物质相结合的二元论者,他们接受老子的一些观念只说明二元论者不排斥观念的作用,但这并不证明老子不是观念决定论者。至于强调物质作用的兵家或法家人物商鞅和秦始皇有讨论过王道的记录,只说明他们对王道问题有自己的认识,而不能说明他们接受了老子的思想观念,更不证明老子不是观念决定论。这如同独身主义者谈论婚姻问题并不说明他们接受了婚姻家庭的观念。

《荀子·富国》。

《荀子·性恶》。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60—78.

徐进博士认为荀子是观念决定论者,这与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荀子是观念与物质相结合的二元论者。例如,荀子说“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这句话将社会地位、恶欲和物质匮乏三个自变量合起来作为冲突的原因。除了恶欲可以解释为是观念因素外,社会地位和物质匮乏都显然是物质因素。思想史学界很多学者认为荀子是儒法兼蓄的思想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荀子不是观念决定论者,而是一个二元论者。如果将荀子和孟子相比,孟子应比荀子更强调观念的作用而不那么重视物质的作用。

徐博士同意一些学者为孟子人性善观念所做的辩解,认为孟子不是“性本善论”而是“心有善端可以为善论”。这种解释其实并不能减少孟子性善论的缺陷。首先,“心有善端可为善”的说法,并不能排除心无善端也可为善和心有善端仍可为恶的两种可能。也就是说心有无善端与是否为善没有关系;第二,心一端为善另一端为恶,于是哪一端起作用就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了。从方法论讲,心性成了常量而不再是变量。荀子认为孟子性善论的最大缺陷是没有区分“性”和“伪”。他认为性是天生的,伪是后天的,前者为恶,而后者为善。荀子性为恶、伪为善的观念也有很大缺陷,因为人后天的品德也有良莠之分。不过,他关于性是先天的、伪是后天的,这种观念是值得借鉴的。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只有我们承认导致人类暴力冲突的社会自然因素是一样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分析什么样的社会人为因素有利于抑制暴力行为和什么因素易于诱发暴力冲突。决策者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他们的认识差别主要取决于后天的生活环境差异而非先天的生理差别。故此可见,孟子的性善论缺少科学性,不适于我们创建新的、科学性强的国际关系理论。

三、如何理解王权与霸权的区别

在先秦诸子有关国家间关系的论述中,中心的主题是王权与霸权。自孟子对王权和霸权做了性质区分之后,后人对于王权与霸权的性质讨论就层出不

《荀子·王制》。

《荀子·性恶》。

穷。杨倩如博士认为,在先秦人士的观念中,王权与霸权是相互联系的,两者不是对立的。王权与霸权有相关性这一点先秦人士没有分歧,但是在两者是否对立的问题上则不同流派有不同看法。在《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一文中,我介绍了先秦七位思想家对于王权和霸权的认识。其中老子、孔子、墨子和韩非子都没有区分两者的不同,但管子、孟子和荀子做了区分,特别是孟子强调两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如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此外,在王权与霸权的共性方面先秦人士没有分歧,而分歧的焦点是两者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提醒我们,今天研究先秦时期的王霸思想,其重点是了解两者之间的差别而非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

王权与霸权是性质之别还是程度之别,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王日华博士认为在先秦哲人的观念中,王权与霸权具有等级差别。这一判断符合事实,但这种等级差别是程度差别还是性质差别呢。徐进博士意识到,孟子与荀子关于霸权的分歧焦点就是在这一点上认识不同。孟子认为两者是性质差别,王权以仁义为目标,而霸权是打着仁义的旗号追求权力。荀子则认为两者是程度差别,霸权也有仁义,只是仁义水平低于王权。笔者以为,理解先秦哲人在王霸认识上的差别,有助于我们弄清王权与霸权的区别以及这种判别对于国际体系的不同影响。

王日华博士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霸权论认为国内层次因素对国际层次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有可能使读者误以为政治霸权论是内因决定论。先秦哲人将政治实力视为霸权实力的核心要素,是说实力不均衡发展根本动因在于各国政府的领导能力的强弱变化。不过,政治实力这个要素,从本国实力角度观察,它是个国内层面因素,而若从他国实力角度观察,它就变成了国际层面的因素。也就是说,奥巴马上台提高了美国的政治实力,对美国讲这是个国内因素;但对于中国来讲,美国国际政治动员力的提高则是一个国际因素,因为美国政治实力的提高使中国的政治实力相对下降。在先秦哲人中,管子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很典型,他说:“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还说:“夫先王所以王者,资邻国之举不当也。”也

《孟子·公孙丑上》。

《管子·霸言》。

就是说,先秦思想家们对于霸权的认识已经有了从国际层面进行比较的相对实力概念。烛之武的“邻之厚,君之薄也”更是典型的从国际层面理解实力的思想。

后人将孟子和荀子都视为重要的儒家思想家,但荀子对孟子有很多的批评,因此有关荀孟分歧就成了学界研究的重要领域。徐进博士注意到,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中国像孟子一样反对霸权,而美国像荀子一样注重霸权的诚信。他认为在霸权上中美分歧与孟荀分歧都源于对于霸权的定义不同。从国际关系专业的角度讲,Hegemony一词在英文中的确没有贬义,其意为比他国大得多的影响力或权威。语义的影响是明显的,但我以为中美对于霸权的不同政治立场不仅受语义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他们不同国际地位的影响。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就拥有霸权地位,而中国自1840年起就一直受到列强的侵扰。中国是从国际秩序的政治正确性角度认识霸权,而美国是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的角度观察霸权。在阅读《孟子》和《荀子》时,我们能感到孟子是从政治目标是否正确的视角批评霸权,而荀子是从秩序是否稳定的角度评论霸权。

徐进博士认为,“荀子以楚地大于汤王和武王的领地也未能获得天下为据,说明实力对王权并不重要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笔者以为,如果荀子论证一国实力强于他国并不必然能获得王权,这样的逻辑是成立的,但是当他论证一国实力大小与获取王权无关时,其逻辑则是不成立的。以弱胜强和国际政治中心转移都是国际政治中的常见现象,但这两种现象并不能说明实力大小与获取世界主导权无关。实力不均衡发展是个过程,获取王权和霸权就是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过程。在汤王和武王在与夏桀和商纣王对抗的初期,其硬实力肯定小于夏桀和商纣,但在汤王和武王最终赢得了这场对抗时,他们的硬实力就超越了被灭亡的夏和商。也就是说,在商汤王和周武王最终获得王权的时间点上进行实力比较,他们的硬实力则是当时体系内最强大的。这如同1946年中国内战开始时,国民党的硬实力大于共产党。但1949年共产党获取国家政权

《左传·僖公三十年》。

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Springfield: G & C Merriam Company, 1977), p. 531.

Daniel Bell, *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2.

时,其硬实力则超过了国民党。

王权国依靠其超强的道义实力使其综合实力位居体系内第一,其硬实力有可能不是既定时期最强大的,但其硬实力的水平也不能太低。从人类历史上看,能获得体系领导权的国家,无论其性质如何,其硬实力都属于当时第一等级的。在未流硬实力的基础上靠道义获取王权还是不可想象的。在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中,领土规模对于获取国际体系主导权的重要性已大为下降,但是人口规模却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低于一亿人口的国家是无论如何都没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虽然,冷战后出现的“一超多强”概念包括了英、法、德这些人口不足一亿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没有在 21 世纪成为体系主导国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和德国采取区域多极化战略而非国家多极化战略。

四、借鉴先秦什么思想发展现代理论

先秦思想家们的著述有许多思想火花,但是这些思想认识缺乏完整的体系性。故此,我们主要是从两方面借鉴他们的思想来发展现代理论。一是借鉴他们对于国家间关系本质的认识。由于国家间关系的基础是人性,而人性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他们对于国家关系本质的认识很可能具有永恒性;二是借鉴他们用于理解国家间关系的概念。这些概念是一些古老的思维工具,然而正是因为古老所以很可能适用的历史时期更为广泛。其广泛的适用性恰好可以提高理论的有效范围。

先秦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权力都是等级结构,这一点显然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假定不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普遍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结构(anarchical structure),即行为体功能相同,权力关系平等;而国内体系是等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行为体功能各异,权力体现为上下级关系。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今天的国际体系,我们会发现,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内部权力关系其实也都是等级结构而非平等结构。联合国分为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和普通会员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则依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81—82, 93, 97.

据股权的多少决定投票权。如果我们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权力平等的概念与先秦时期的等级权力概念相结合,我们会得出一些新的设想。例如,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关系既非上下级关系,也非平等关系,而是松散的等级关系;国内体系的权力关系由社会规范决定,而国际体系权力关系由国家能力决定;在国内体系内,等级规范主导社会行为,而在国际体系内,等级规范与平等规范共同主导国家行为。

先秦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以等级规范约束国家行为可以维持国家间的秩序,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则认为,以平等规范约束国家行为才能维护国际体系的秩序。观察人类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绝对平等关系导致绝对的暴力冲突,绝对的等级关系导致绝对的以强压弱暴政。如果我们将两种思想认识相结合,则可以假设平等规范与等级规范相结合,是最有利于维护国际秩序的。等级规范具有要求强者承担较多国际责任和弱者遵守歧视性国际规则的功能,例如发达国家应将 GDP 的 0.7% 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无核国家不得拥有核武器。平等规范则具有保证同级别国家享受同等国际权力和不同级别国家遵守公共原则的功能,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享有否决权,所有联合国成员都不得以武力吞并其他成员。

先秦的思想家们非常重视主导国对于国家间规范效率的影响,而现代理论则强调制度对于国际规范效率的影响。前者强调规范是否得到遵守取决于主导国的模范作用,后者注重制度本身对于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如果我们结合两者,就可以从主导国性质的角度去理解制度规范内化的进程。根据现代理论,我们已知国际规范的形成过程为大国提出、多数国家支持,而后在长期执行中内化为自觉行为。然而现代理论对于国际规范的内化过程还缺少解释。根据先秦哲人在王权和霸权性质问题上的认识,我们知道王权具有带头执行国际规范和维护国际规范的作用,而霸权国则缺乏这种特点。借鉴这种认识,我们可以研究主导国性质对于国际制度建立后其规范内化的路径。根据克林顿 (Bill Clinton) 的多边主义政策和小布什 (George Bush Jr) 的单边主义政策对国际防扩散规范分别形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我可以假设,主导国提供的不同性质的领导,对于国际规范内化的方向和速度具有不同的作用。

霸权是个古老概念,关于霸权的基础是个长期争论的理论问题。王日华博

士注意到,先秦思想家们以政治实力为霸权的核心要素,这不同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以硬实力为霸权的核心要素。根据这种分歧,我们可以比较在新中国崛起的60年历史进程中,这两类实力要素哪个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9年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和1979年中国政治路线的变化,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两个时点上中国的国际实力地位并没有发生突变,但是带来了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长期增长。与此相同,中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每年增长都没有带来即时的国际实力地位的变化,而是长期积累之后才带来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政治实力的增强能带来硬实力的增长,而硬实力增长却不必然带来政治实力的增长。例如,中国所经历的1989年6.4事件、2008年3.14藏独事件和2009年7.5疆独事件。根据这种比较,我们可以假设政治实力转化为军事和经济硬实力的增强是获取国际主导权的基础。也就是说,霸权建立在硬实力的基础上,而硬实力又是以政治实力为基础。政治实力的基础越宽厚,所能转化出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越强大。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种霸权、硬实力、政治实力这样一个三级金字塔式的霸权理论框架。

先秦思想不仅可以用于分析现实国际政治,还可以作为预测国际政治未来走向的工具。杨倩如博士认为,对先秦国家间思想的研究是面对过去历史的研究,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面对尚未发生的未来的研究。其实并非如此。无论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还是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我们都要依据已发生的历史事实,而不能依据我们所想象的或预测的未来。我们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检验先秦思想和现代理论的解释力,并从中总结归纳出解释力更强或更可靠的理论。此外,我们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都可以是面向未来。我们重新研读先秦著述,目的是从中找出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现代世界发展趋势的分析框架和概念。例如,借鉴先秦哲人关于王权与霸权区别的思想工具,我们可以预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美国领导人后将使美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得到不断提升。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采取支持控制气候变化的政策,赢得了欧洲传统盟友的好感,由此现象可初步支持这种预测。今后四年,奥巴马的执政结果将会检验这一预测是否正确。

五、怎样将先秦思想与中国崛起联系起来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治”，王权与霸权是治的两种形态。如今的中国崛起对内对外仍都是一个治的问题。对内是如何建设一个文明富强的社会，对外则是如何建立国际新秩序。故此，研究先秦国家间的政治思想有助于思考如何实现中国崛起以及崛起成何种国家的问题。胡锦涛主席在第十一次使节会议上提出的外交目标是，“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这些目标的提出，不仅标志着中国不再以邓小平 1990年提出的韬光养晦为最高外交原则，不再以增加经济利益为最高外交目标，而且表明，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如何做世界主导国和做什么样的世界主导国的角度思考对外政策。这些目标还表明，中国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政治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对于获得世界主导权的重要意义。学界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就是要通过借鉴来丰富我们对中国崛起的基础、战略、影响等多方面的认识。

先秦诸子对于国家间政治的认识有些是对立的，借鉴什么思想指导中国崛起是当今研究人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自 1998年我出版《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一书以来，中国学界就一直为中国是否应崛起和如何崛起而争论，2004年甚至中国政府也卷入了这场争论之中。杨倩如博士认为，中国政府应借鉴老子“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的思想，不可以崛起为民族目标。在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厚黑学是一股强大的思潮，此类书籍成为机场书店中有关古代思想研究成果的主体。厚黑学提倡借鉴古人的谋略以图私利。我以为，如果以民族复兴或崛起为目标，我们需要的不是古人的谋略，而是他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国家大战略只能依靠现实环境为依据，而时代的变化会使任何历史上成功的大战略过时落伍。民族复兴的目的在于促进中华民族更进步、更文明和更富强，而非更世故、更圆滑和更满足现

《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召开 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7月21日，第1版。

《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与国际战略》，《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第5—20页。

状。民族复兴的目标需要中国人付出巨大努力和奋斗才有可能实现,而若以老子无为思想为指导,中国是绝无实现民族复兴可能的。中国需要借鉴有积极意义的思想,例如借鉴“信立而霸”的思想,中国对外政策就会以维护战略信誉为目标;借鉴“古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思想,中国就会坚持依据国际规范的正义原则使用国防力量。

研究先秦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历史,不能正视历史事实的民族是不可能使其他国家心悦诚服的。杨倩如博士认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从未将称霸世界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如果以直到大清帝国末年中国人才具有现代科学地理知识为准,我们可以说,自清末以来中国从未将称霸世界作为自己的目标。然而,这个事实并不证明中国在此之前没有称霸世界的目标。先秦诸子关于王霸的争论就是讨论王天下和霸天下的问题。在没有现代科学地理知识之前,中国人所说的“天下”就是指天空下面的全部土地、海洋和人口。天下与世界的词义基本一致。“天子”的概念是指代表上天统治大地上所有人的人。中国封建帝王以天子自居,说明他们认为自己是世界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可从另一角度说明对天子权力的争夺在理念上就是争夺世界主导权。研究先秦国家间思想具有以古为镜知兴替的作用,从而预测不同崛起战略所可能带来的不同结果。具体而言,就是借鉴先秦思想,重新思考我国崛起战略,避免苏联式的半途夭折和日本式的停滞不前。

借鉴先秦思想绝不意味排斥西方的民主观念。有些人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对立起来。这种做法实际上忽视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共性方面。杨倩如博士认为,中国如果接受了现代民主观念就无法建立自己的王权国际秩序。笔者以为现代民主观念与中国古代的王权观念在遵守规范这个原则上是一致的。例如,在先秦时期,王权的具体内容是西周时代的礼仪规范,但其内核是指普世的政治道义准则。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普世的政治道义准则在不断变化。例如,长子继承制曾是普世的政治道义规范,在现代社会它就被选举制规范取而代之了。选举制是现代的普世性的政治道义准则,即使坚持一党统治

《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与国际战略》,《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第5—20页。
《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

的国家也采取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方式。中国虽然坚持共产党一党执政,但保留了八个民主党派,实行多党政治协商制度。既然民主是现代普世性政治道义准则,中国在借鉴先秦“义立而王”的思想时,就需要将民主作为道义原则之一来推行。事实上,中国已经提出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外交原则。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外战略所注重道义原则更应区别于美国霸权下的国际秩序。

借鉴先秦有关王霸性质区别的认识,中国崛起战略的对外政策需要从三方面区别与美国。首先,推行责任与权力相一致的国际秩序原则。在任何时代,国家实力都有差别,因此国家根据实力大小享受不同的权力和承担不同的责任,这有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中国不宜采取美国目前的作法,口头上宣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而实际上不可能不追求美国权力独大的国际地位。美国这种言行不一的政策实际上被国际社会视为是虚伪的霸权。

二是推行反向双重标准原则,即越发达的国家要执行比越落后的国家更为严格的国际准则。例如,京都议定书中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有差别地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标准就属于这一类。中国不宜采取美国推行国际社会统一标准的作法。特别是在政治方面,反向双重标准原则比统一标准原则更有利于维护国际秩序的稳定。世界上有200多个政治实体,其间差别太大,统一标准只能加剧冲突而无助于减少他们之间的摩擦。

三是推行东方传统的天下为一的开放原则,即中国对全世界开放,世界各国对中国开放。自欧洲发明了现代民族国家之后,国家对边界的控制越来越严,以至世界总体趋势不是融合为一,而是不断分裂。冷战后美国获得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后,不断严格其边界控制政策。9·11之后更是对外国人采取按指纹的进境管理制度。边界控制越严,国家之间的猜疑就越严重,对立观念就越强。中国应在全球推行旅行自由、居住自由和工作自由的原则。人往高处走,条件越好的地区越能吸引有能力的人,因此中国有必要将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推广到国际社会。

《荀子·王霸》。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4版。

虽然有关先秦国家政治思想的研究在中国已经引起学界关注,但尚未引起国际同仁们的关注。为了能较快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有三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做。一是将中国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译成英文,介绍给国际同行;二是开拓中国先秦国家间思想与欧洲古代国家间思想或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三是在借鉴先秦思想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三点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创造出新理论才能充分证明研究先秦思想的价值。为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中外学者参加到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的行列中来。

作者简介

刘 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和 2009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电子邮箱: liufeng00@gmail.com

冯惠云 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1994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和 2005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分别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最新著作为 *Chinese S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and War*。电子邮件: huiyun_feng@asu.edu

王一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8级硕士生。200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电子邮箱: holdself@hotmail.com

田 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1998、2001和 2004年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电子邮箱: tianye@ruc.edu.cn

王 鹏 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2008级专门史研究生。电子信箱: greatbird1020@sina.com

郭 莹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著有《中国社会史论》、《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等。电子信箱: guoyinghbdx@163.com

王日华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1999年在安徽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4和 2008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电子信箱: wangrihua@gmail.com

徐 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8年获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编著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合编),译著有《战争与国家形成》。电子邮件: xuj@cass.org.cn

杨倩如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200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史学史与中国文化传统。电子邮件: shirley_yqr@sohu.com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最新代表作为《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合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国际关系分析》。电子邮件: yanxt@mail.tsinghua.edu.cn